

烽火薪传

抗战时期文化机构大迁移

孟国祥 著

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展示战时博物馆、图书馆、出版机构、艺术团体等文化机构从谋划、准备到实施搬迁的全过程及特点，以及大批学人烽火战乱之际的社会担当，呵护和传承中华文化的坚守与情怀。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烽火薪传

抗战时期文化机构大迁移

孟国祥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烽火薪传：抗战时期文化机构大迁移/孟国祥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5

（抗战大迁移丛书）

ISBN 978-7-100-11289-5

I. ①烽… II. ①孟… III. ①抗日战争—文化机构—迁
移—史料 IV. ①G129②K26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03561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烽火薪传
——抗战时期文化机构大迁移
孟国祥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1289-5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5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3 5/8

定价：45.00 元

总 序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前夕，商务印书馆推出了“抗战大迁移”丛书，共五本：唐润明《衣冠西渡——抗战时期政府机构大迁移》，张守广《筚路蓝缕——抗战时期厂矿企业大迁移》，孟国祥《烽火薪传——抗战时期文化机构大迁移》，王红曼《伏线千里——抗战时期金融机构大迁移》，常云平、刘力《乱世飘蓬——抗战时期难民大迁移》。

南宋以降，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逐渐向东南转移，民国建立，孙中山、蒋介石先后定都南京，政治中心也自北京转到南方。东南一带濒海，有与海外交通、习染欧风美雨之利，繁荣富庶，人丁丛衍。然而，利弊相生，东南一带地势平坦，不是能攻易守之地。近代和古代不同，古代中国的外敌大多来自北方，而近代中国的外敌则大都来自海上。这样，东南地区地理上的优势便转化为军事上的劣势，一旦外敌入侵，作为经济中心的上海和政治中心的南京等地便立即暴露于敌人的炮口之下。南京，一向以龙盘虎踞著称，但早在民国初年，孙中山就判定，中日之间必有一战，南京不是可战之地。1931 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于次年 1 月进攻上海闸北，发生一·二八淞沪抗战。当时，蒋介石就曾考虑“迁移政府，与倭长期作战”问题，认为“政府倘不迁移，则随时遭受威胁，将来必作城下之盟”。两天后，国民政府暂移洛阳办公。1932 年 3 月 1 日，国民党在洛阳召开四届二中全会，决定以

西安为西京，洛阳为行都。洛阳虽处于中国中心，但属于四战之地，无险可守，并不能成为理想的战时首都。12月1日，国民政府迁回南京。

迁都，只是政治中心、军事中心的转移。1934年1月，国民党召开四届四中全会，蒋介石向会议提出《确立今后物质建设根本方针案》，其中提出：国家及私人大工业今后避免集中于海口；道路、航路之开辟，尤须首先完成西向之干线，使吾国于海口外，尚有不受海上敌国封锁之出入口；于经济中心区附近不受外国兵力威胁之地区，确立国防军事中心地。这一方案的提出，表明当时国民党领导人在设计经济建设计划时，已经考虑到对日作战的需要，并且考虑到向西部发展的问题。因此，蒋介石在为自己规定当年任务时，即列入“专心建设西南”一项。1935年2月，他在庐山规划国防工业方案，电令赶筑西南各省公路。同年3月，蒋介石在重庆演讲，明确提出“四川应为复兴民族之根据地”。他特别致电孔祥熙，告以“我方军事与政治中心全在四川”。1936年6月，蒋介石对来华的英国经济学家李滋·罗斯表示：“当战争来临时，我将在沿海地区做可能的最强烈的抵抗，然后逐步向内陆撤退，继续抵抗。最后，我们将在西部某省，可能是四川，维持一个自由中国，以待英美的参战，共同抵抗侵略者。”这一谈话表明，在蒋介石心中，其抗日计划已经非常明晰。同年9月，陈济棠、李宗仁等发动的两广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认为“集中对倭”的条件已经成熟。当时，中日之间的“调整国交”谈判陷入僵局，日本态度强硬，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蒋介石指示冯玉祥、程潜、朱培德等人拟具抗战方案，首先进攻上海日军，指示孔祥熙将上海的现银、钞票等迅速转移到南昌等地，指示在南京的中央政府各部门做迁移准备。这就表明，差不多在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前一年，国民党、国民政

府已经有了迁移的准备和计划。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继之以淞沪抗战。日军以28万人之众，动用军舰三十余艘，飞机五百余架，坦克三百余辆，大举进犯。中国军队以落后的武器和血肉之躯英勇抵抗，血战三个月。11月12日，上海沦陷。11月16日，国防最高会议决定迁都重庆。当晚，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乘舰西上，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等五院随迁。20日，国民政府发表迁都宣言，谴责日军“分兵西进，逼我首都，察其用意，无非欲挟其暴力，要我为城下之盟”。《宣言》表示：“此为最后关头，为国家生命计，为民族人格计，为国际信义与世界和平计，皆已无屈服之余地，凡有血气，无不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决心。”“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华民族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本必死之决心，以其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离。”在此前后，各政府机关、工矿企业、金融机构、文化团体响应国家号召，前所未有地紧张动员，争分夺秒，纷纷西迁，数以百万计的民众不甘于受日寇的欺压、蹂躏，扶老挈幼，千里跋涉，倾室流亡，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未有的大迁移、大搬家。这一迁移，动员之广泛，规模之宏大，过程之艰辛，民族意志之刚毅，人民爱国热情之昂扬，都是中国历史，甚至是世界历史所少见，或仅见的。它突出地表现了中华民族临危不惊，履险不畏，在艰难条件下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可歌可泣，可记可录，值得中华民族子孙后代永远铭记，作为驱动民族振兴的永恒的精神财富。

多年来，当年的参与者和有心人为保留、记录这段历史做了不少工作，留下了不少资料，但是，研究和叙述这一段历史的著作还寥若晨星，许多通史性的著作对此或语焉不详，或草率带过。现在唐润明、

孟国祥等先生的这五本书，以丰富的资料，全面、深入、翔实地叙述了抗战时期，自政府机关、工矿企业、金融机构、文化教育团体以至广大民众的迁移史、流亡史，评述了这一迁移在粉碎日寇速战速决阴谋，保存和发展抗战实力，建设西南后方，夺取最后胜利等方面的重大意义，这就填补了抗日战争史的一段重要空白，是民国史、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深入和拓展，值得庆贺。

杨天石

2015年5月写于北京东城之书满为患斋

前言

抗日战争时期，广大爱国的文化人及文化机构在外敌大举入侵、身遭亡国灭种威胁之际，为了延续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建构文化抗战的后方基地，冒着枪林弹雨，克服艰难险阻，毅然跋山涉水，开启了文化万里大迁徙。其规模、其艰辛、其贡献史无前例，远非中国历史上的“衣冠南渡”可比。文化机构内迁史，其中有悲壮，有欢乐，也有血泪。它们与战时中国政府部门、军事机构、企业内迁等一道，构成了中华民族生存和复兴史上一次壮观的万里长征。

作为本体论的历史，文化机构内迁已经成为过去。但作为认识论的历史，却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可以多维度、多视觉的钩沉其真相，在遵循真实性的基础上解读其意义。相比其他同类题材的研究，为体现特色，本书做了如下的探索和尝试：

立足于“内迁史”，试与一般“文化抗战史”相区别。目前，关于文化人对抗战战争的研究成果林林总总，如《抗日战争文化史》《抗战时期的大后方文化史》等，对战时文化播迁的作用与意义均有较全面评价，而对内迁运动的过程大都一笔带过，多为写意性的描述。而本书力图以实证为基础，阐述内迁决策的形成，内迁的组织实施，内迁的艰辛与悲壮，以及在传播文化方面的努力，至于内迁至大后方的文化机构所起的作用方面，落墨不多，仅做简要的归纳与总结。

文化是大概念，其与教育、科技密不可分。文化机构大凡有学校、博物馆、图书馆、文艺团体，以及报刊出版机构等。而战时其中任何一方面的内迁，都有声有色，内容极为丰富，可以独立成书。拙著所涉及的文化机构为博物馆、图书馆、文艺团体和书报出版四方面。写法上，独立成篇，以专题相串，总分结合，在概要介绍内迁的基础上，强化内迁个案的叙述。

本书致力于团体和机构的内迁，对个人在内迁或在大后方的情感世界、文人风骨、心路历程没有过多涉及。作家、画家虽然也可归属于“文艺界抗敌协会”“美术家抗敌协会”之类的组织，但此类机构较为松散，他们是自由职业者，其内迁多为自发的随机而行，因此本书没有对这类文化人群的内迁做专门论述。

全书注重内容的全面性。如古物内迁方面，目前相关论著多集中于北平古物迁徙的描述，其实故宫古物内迁只是战时中国文物内迁的主要部分，而不是全部。本书增添了中央博物院、地方博物院（南京、河南、广西）文物转移的史料；图书馆内迁方面，在重点叙述北平图书馆、中央图书馆等国家图书馆的同时，以较多的篇幅全面介绍了各省立图书馆的内迁与转移。

笔者在写作过程中发现，本书所涉及内迁的四个领域，可供利用的档案极少，现有的相关成果多为当事人的回忆及报刊文献。笔者努力挖掘原始档案，尽可能运用第一手的资料，以增强其说服力。因此，北平古物转移的决策，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的迁徙等，渐渐清晰起来。一些新史料的发现，也丰富了本书内容。如省立镇江图书馆 14 000 余册图书辗转湖南等地，为以往研究所未见。

应该说明的是，由于文艺团体、出版业方面内迁资料极为零散，

笔者乃从当事人的回忆、日记及报刊文献中找寻、辨正、拼接起内迁历史的碎片，尽可能勾勒和描绘出内迁的大致轮廓。本书所展现的文化机构内迁，是典型意义上的，或者说是象征意义上的，远非文化机构内迁的全部。

文化机构的内迁，说到底是由流徙文人主导的文化传播活动。战时文化人，他们纷纷走出大都市，因应战局而迁徙，乃至到达内地小城、穷乡僻壤，创造新的文化中心。走进这段历史，便可发现，他们迁到哪里，文化知识就普及到哪里，抗战文化宣传的火种就带到了哪里！一路迁徙，“戏剧下乡”“文章入伍”；漫画宣传，如火如荼；电影艺术，气象更新；抗战报刊，绝地奋起。循着内迁的足迹，透过历史的背影，可以发现那批学人为呵护和传承中华文化的顽强坚守，对传播和推动文化建设的学术自觉，“忧道不忧贫”的高贵精神，烽火战乱之际的社会担当，以及那份根植于心的对祖国和民族深沉而博大的爱！

文化是人的存在方式，文化是社会人创造的产物。战时的文化机构万里迁徙，不仅体现着一种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沉重的文化承载，也体现了文化的新创造。内迁所体现的这份精神，这份荣光，必将传诸永远！

目 录

前言.....	1
综 述	1
古物内迁篇.....	15
一、风雨飘摇中的中国博物事业	16
二、论辩声中的北平古物南迁	26
三、抗战烽火中的漫漫西征	55
四、地方博物馆的迁徙及损失	90
五、战后文物的东归与分流	108
六、文物成功内迁原因透视	120
图书机构内迁篇.....	131
一、抗战硝烟下各类图书馆的转移	132
二、国家级图书馆的内迁	145
三、省立图书馆典籍与古物的西迁	170
四、省立图书馆在境内的转移	204
五、教育科研机构的图书转移	230
六、后方图书馆事业的复兴	244

艺术团体播迁篇·····	251
一、流离颠沛的电影业·····	252
二、烽火中的剧团内迁·····	273
三、弦歌不绝的抗战音乐·····	311
四、流动的抗战漫画·····	331
书业报刊内迁篇·····	351
一、风云激荡的报业内迁·····	352
二、图书出版机构的内迁·····	381
后 记·····	420

综 述

(研究视域中的文化迁徙)

抗战时期文化机构的西迁,已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华民族前行的精神泉源。70余年来,人们不断地钩沉历史,从不同视角总结经验,探寻其中的意蕴,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为便于读者更好地把握文化机构的内迁,笔者试就博物机构、图书馆、文化艺术团体、报刊出版业内迁的相关研究成果,做如下简要的概述。

一、古物及其机构内迁

目前关于故宫文物内迁的著作有20余部,可以分为当事人的记述、当事者后人的回忆以及他人的著述。

当事人记述方面,最早是那志良在台湾《传奇文学》长篇连载的关于故宫及其内迁的文章,这在大陆出版较早的《抗战时期的文化教育》(北京出版社1995年)专节“文物古物的南迁和西迁”中有所介绍。那志良出版了多部故宫忆往的著作,如《我与故宫四十年》(台湾商务印书馆1963年)、《抚今忆往话国宝——故宫五十年》(香港里仁书局1984年)、《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中国大陆黄山书社根据其在《传奇文学》的连载集结出版了《我和故宫五十年》。

杭立武编著的《中华文物播迁记》（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0 年），根据档案史料及本人参与决策的经历写成，重点介绍了抗战胜利后文物迁往台湾的过程。庄严的《前生造定故宫缘》（紫禁城出版社 2006 年），记述了故宫文物南迁的历程。

随着海峡两岸交流扩大及对中华文化认同的加深，自 2000 年起，大陆抢救性地出版了文物内迁当事人日记、回忆录等。如，紫禁城出版社出版的马衡的系列作品，《马衡日记·1949 年前后的故宫》《马衡诗抄·佚文卷》等，吴瀛的《故宫尘梦录》（紫禁城出版社 2005 年）、《故宫盗宝真相》（华艺出版社 2008 年），故宫博物院还根据欧阳道达 1950 年的手稿出版了《故宫文物避寇记》（紫禁城出版社 2010 年）。

故宫文物内迁当事者后人的著作有，庄灵的《前生结定故宫缘——父亲庄严与南迁国宝的故事》（紫禁城出版社 2006 年），以图释文，生动再现南路文物迁徙的情景。马思猛（马衡之孙）的《金石梦 故宫情》（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09 年）、《攒起历史的碎片》（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7 年）等。

纪实性著作，林林总总。如，姜舜源的《紫禁城秘闻》（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4 年）、刘金库的《国宝流失录》（辽海出版社 1999 年）、张健的《国宝劫难备忘录》（文物出版社 2000 年）、马军骧的《国宝》（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4 年）、吴十洲的《紫禁城的黎明》（文物出版社 1998 年）。向斯的相关著作有：《斜阳下的宫殿：民国时期故宫往事》（长虹出版公司 2001 年）、《故宫往事》（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6 年）、《最后的紫禁城》（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7 年）、《故宫国宝宫外流失秘笈》（中国书店 2007 年）、《珠

联璧合 两岸故宫文物故事》(华艺出版社 2011 年)等。

纪实性著作对研究也多有帮助。如,柳坡、博溪编著的《故宫观澜》(紫禁城出版社 2009 年),作者通过在宝鸡等地实地考察和走访知情人,为文物北路迁徙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再如,章剑华的《承载》(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年)以纪实的文学笔法,再现了故宫人的心路历程与情怀,同时还披露了现今南京朝天宫地库保存内迁古物的情况。

在研究方面,俞建伟、沈松平的《马衡传》(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7 年),郑重的《徐森玉》(文物出版社 2007 年),在史料运用与评述方面颇有深度。由于马衡曾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参与内迁决策与实施,对他的研究有助于把握内迁的全貌。

各地在修史编志过程中,也涉及内迁档案的利用和史料考证。故宫博物院出版的《故宫档案》1—4 册,其中就有内迁史料。《北京档案史料》(1995 年)也选载了颐和园古物南迁与北返的史料。北京博物馆学会主编的《北京博物馆年鉴:1912—1987》(北京燕山出版社 1989 年),对北京地区文物的南迁有概要叙述。2012 年四川天地出版社出版的《故宫文物南迁》一书,收录 16 篇亲历亲见者的回忆文章。所有这些,无疑为深化该专题研究提供了资料。

在知识普及方面,影视传媒、网络文章、纪实文学作品,以其趣味性、生动性、形象性,迅速传播开来。如中央电视台录制的系列电视片《故宫国宝》《台北故宫》及《中央博物院》等。

上述成果,视角不同,风格不一,归纳起来,它们涉及古物内迁背景,迁移决策及其实施,迁徙路线及其争论,内迁的作用,成功的原因及意义评价诸方面。而故宫博物院原院长郑欣淼所撰的《故宫

文物南迁及其意义》（《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一文，对上述诸方面做了总结性且富有价值的思考。

对文物内迁这一伟大工程的研究，上述成果显然是初步的，还缺乏全面而深入的研究。由于海峡分隔，两岸互相利用档案史料存在诸多不便，使得成果更多关注迁徙过程的史实描述；由于文物内迁是在十分紧急和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留下的资料很少；而对政府在内迁中的组织、民众支持等方面研究明显薄弱；由于战后政治别途，对迁台人员在文物内迁中的作用，缺乏客观的评价；关注文物的典守，缺乏从文化抗战视角理解文物内迁的意义。

目前有关文物迁移的论著，除当事者论著外，大都以史实描述为主，对内迁史实的知识普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当事人的论著大都是回忆性的，由于文物内迁路线多，时间长，当事者战时大都负责某一路线、某一阶段的押运与保管，缺乏对内迁全局性的关照。如杭立武的《中华文物播迁记》，主要叙述他负责将文物运往台湾的部分，而战时内迁部分则过于简略。也正因为他只参与了文物从南京起运这一阶段的工作，所以他便聘请迁台的故宫人帮助完成此书。

研究的对象也较为单一，现有论著更多关注故宫古物的迁徙，而对地方博物馆文物的内迁研究甚少。目前涉及故宫以外文物迁徙的论著，仅见谭旦冈的《中央博物院廿五年之经过》（台湾商务印书馆1960年），以及屈万里战时撰写的《载书播迁记》一文。由于缺乏对文博管理机构沿革的研究，人们甚至认为战时文物西迁是在中央博物院领导下进行的，并将北平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的古物内迁，归同于故宫博物院古物的内迁。

二、图书机构的内迁

图书馆机构内迁的系统研究还没有开展。目前有关战时图书馆的内迁,散见于出版的各类图书发展史著作中。如严文郁的《中国图书馆发展史:自清末至抗战胜利》(台湾枫城出版社1983年),谢灼华主编的《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杨宝华、韩德昌的《中国图书馆史》(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以及抗战文化史研究的相关著作,如《抗战时期的文化教育》(北京出版社1995年),史全生主编的《中华民国文化史》(吉林出版社1988年)等。上述论著对图书机构内迁的叙述过于简略,更多的是从战时文化发展或损失的角度叙述的。战时,大多数高校所属图书馆也随学校内迁,因此现今一些高校的图书馆的馆史也有所反映。

目前有关图书馆损失的论文很多,但涉及图书馆内迁的文章仅有《抗战时期的浙江省立图书馆》《抗战时期的江西省图书馆》《抗战时期的河南省立图书馆》以及《抗战时期的湖北省图书馆》等为数不多的几篇。目前出版的图书馆档案史料也极少。北京图书馆出版的该馆史料汇编,为国内所仅见,其中有少量该馆内迁的史料。

人物研究的相关传记中涉及个别省市图书馆内迁的内容。如李勇慧的《一代传人王献唐》(山东教育出版社2012年),就介绍了山东省图书馆、山东金石保存所的图书古物内迁梗概。

在地方图书内迁中,社会关注度高的迁徙案例,研究的成果也相对较多。如,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内迁,除浙江省图书馆志概要记述外,并有当事人的回忆及后人研究的成果多篇。

总的看来,战时图书馆内迁还没有作为专题研究受到重视。对图